



国际儒学研究

【第二十一辑】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纯 于建福◎主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际儒学研究

【第 二十一 卷】

总主编 陈来 主编

执行主编 李维明 副主编

《国际儒学研究》编辑部

《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一辑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 纯 于建福 主编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儒学研究. 第21辑/单纯, 于建福主编;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08-2567-5

I. ①国… II. ①单… ②于… ③国…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470 号

国际儒学研究. 第 21 辑

作 者 国际儒学联合会 编 单纯 于建福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67-5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会议致辞

教育学习与经世致用并重 知识教育与做人教育并行

——在“21 世纪儒学教育之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 滕文生 3

儒学教育专题研究

重建儒学学科 提高文化自觉 舒大刚 舒 星 7

略论儒家的教育思想及现代意义 苗润田 14

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当代价值 王心竹 25

“仁”与主体际性 傅永吉 34

中国近代教育百年以来的可贵开端

——记清末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家张之洞 程方平 45

清末中小学堂“读经讲经”课程设置与启示 于建福 55

晚清新學制小學德育教科書回顧 (中国香港) 梁紹傑、謝雋暉 66

許地山與二十世紀初儒學教育

——以許氏《群經源流》(未刊講義稿)為中心

..... (中国香港) 馮錦榮 89

儒家传统、新亚精神与全人教育 王志捷 105

尊道與行道

——錢穆《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管窺

..... (中国香港) 陳熾洪 蘇耀宗 116

2 《国际儒学研究》第二十一辑

當代儒家人文主義教育的實踐

——以國學大師錢穆教授創辦新亞書院為案例	
..... (中国香港) 李木妙 統華	130
陳煥章晚年所倡儒學教育及在香港化絕續行 ... (中国香港) 馬楚堅	158
香港儒學教育的發展 (中国香港) 趙令揚	175
儒學的應用：21 世紀新加坡華文教材的反映 (新加坡) 余慧婷	181
儒家女教與德性建立 (中国香港) 孫今涇	191
孔子教伯魚三題 (中国香港) 詹杭倫	200
孟子论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 郭齐勇	214
從《易經》、《易傳》論儒家的婚戀觀念 (中国香港) 鄭滋斌	224
說“孚”——華夏德性之光..... (中国香港) 周錫韜	231

比较视野中的儒学

康德与儒家中的理性与道德：深入思考与探索 (美国) 成中英	239
形而上学论纲 杨国荣	276
中华信仰与中华价值 郭 沂	290
论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人性尊严 单 纯	304
儒家人权道德的自然主义版本 温海明	310
A Confucian One-body Ecological Vision: A Rereading of the Inquiry of the Great Learning PENG Guoxiang	328
Internal and External Normativity : Foundations of Humanity (仁) between Confucius and Kant (德国) Markus Wirtz	339
Values and the Practical i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Challenging the Architectonic of Reason (德国) Christian Krijnen	358
Reason's Rule. Kant's Historic and Systematic Contribu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德国) Günter Zöller	380
Human Nature and Cultures of War ... (美国) Richard N. Stichler	393
“21 世纪儒学教育之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 践	430
“儒学与德国哲学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 沂	436

会议致辞

教育学习与经世致用并重 知识教育与做人教育并行

——在“21世纪儒学教育之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滕文生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尊敬的徐立之先生

尊敬的赵令扬、苏树辉先生

尊敬的刘秀成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2012年新年伊始，大家有机会在祖国的香港、澳门济济一堂，研讨儒学教育的发展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叶选平会长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东道主香港大学，向为会议召开不辞辛劳和卓有贡献的徐立之先生、赵令扬先生、苏树辉先生、刘秀成先生，以及其他为会议竭诚服务的女士、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前来参加研讨会的祖国各地的来宾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为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无论居于何处，无论处于什么历史阶段，都首先是从中华文化中吸取学识和思想，来修身养性、程功积事的。而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儒学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的兴盛与进步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儒学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既重视教育学习，又重视经世致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内圣与外王、学与用、知与行的相互结合和相互统一。而教育学习又是经世致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历来的儒学学者们都十分重视教育，重视对人们进行儒学、国学教育。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和儒学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一生大部分时

间都在从事教育，不仅把教育从官府之学扩展为民间之学，而且摸索出诸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重要教育经验，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在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学学者中，都不乏著名的儒学和国学教育家。而且历代许多名流学者都倡导在教育中既要重视知识积累又要重视思想修养，二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品学兼优”、“德才兼备”。只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们才能在治理社会、治理国家中作出卓越的贡献。

这里，我想引述一段近代著名学者，也是儒学和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谈教育问题的一段话。晚年的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从事教育工作，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说：“现在的学校无非上课下课，文凭是最高目者，无所谓意志的磨炼、独立见解的养成。这是我最担心的。我希望诸君在追求知识的时候，切记要追求个人的修养。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在事情上磨炼，万勿急功近利，以一鳞半爪便到处夸耀。做人做学问，趁年轻，你们努力向前走下去呀！”梁启超先生这番话是目睹当时的教育状况而引发的忧思与感慨，但他对青年人仍寄予殷切之望。现在，我们的国家同八十年前相比情况已大相径庭了，然而我们仍应记着梁先生的话，因为这些话所体现的求知与做人应该统一的精神，正是古往今来无数代人的经验共同形成的教育真谛。梁先生还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这个论断无疑是精辟的。所以，在对青少年和社会成员的教育中，既要始终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又要始终重视个人修养的引导，二者不可偏废。历史的事实证明，通过教育学习掌握儒学、国学的基本知识与思想精华，对于个人思想品德的修养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功效的。

长期以来，香港、澳门在进行儒学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内地这些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鲜经验，可以经常相互交流，以利共同推动儒学教育在祖国各地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儒学文化在育人治上的积极作用。我也衷心希望祖国各地的儒学学者们，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投入儒学教育的活动中竿头更进、再创佳绩。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同内地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民间交往日益频繁。我们这次研讨会，也是这种交往的一部分。可以相信，在内地同香港、澳门的专家学者的相互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各种形式的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将会日甚一日，一定会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恭祝各位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谢谢大家！

儒学教育专题研究

重建儒学学科 提高文化自觉

四川大学 舒大刚 舒 星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今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剧，我国思想文化一直都面临着来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断冲击和挑战。在这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并不算长的两个左右世纪里，伴随着国运的兴衰变革，国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后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的曲折路程。在这场思想文化的争鸣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点的时期，依然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不绝于耳——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决不能消亡！而今，这个声音、这个主张正逐渐壮大。尤其在中国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获得重大突破的当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成为每个文化工作者所强调和力倡的内容。然而，我们要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关键在于什么？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自我否认和自我遗忘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充实自觉与自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身的文化类型和形态，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加强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在学理和学科上发展和巩固自身的文化学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有着 5000 余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其包容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如果要以简练的语言来描述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以儒学和诸子百家（包括释、道）互补为结构，兼融各民族（甚至周边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的庞大体系。这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庞大文化体系自来就是所有中国人所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然而，若一定要在这个庞大体系中确定一个核心主干，不容置疑，它将是儒学。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

的主干，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儒学本身也在这种影响中接受影响，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经典体系、博大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献积淀和成熟的教育体制，以及实实在在的学科和思想文化体系。从而，研究和重构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重建儒学的现代学科地位，就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从经典上看，儒家有所谓《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组合提法。《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继承中国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经典教材，这些经典上记往古历史文化，下启后世思想智慧，它们既是此前历史的记录，也是此后新知的启蒙。老子云：“《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之为“世传旧法之史”，《六经》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历史文化，是《六经》者述古之“史”也。《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阐释后，又成为历史教科书，《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志者，文学是也；道事者，历史是也；道行者，规范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阴阳者，哲学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学是也——《六经》综合反映了上古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内容，是《六经》者，又训世之“经”也。汉代儒者只传《易》、《书》、《诗》、《礼》、《春秋》，谓之“五经”；东汉盛行“七经”，在五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及到唐代，又将《易》、《书》、《诗》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周易》、《仪礼》、《礼记》合称“九经”。五代后蜀政权在成都刊刻“蜀石经”，在“九经”之外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称“十三经”。宋儒又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析出，与《论语》、《孟子》一道并称《四书》。中华5000年文明史，以《六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恰恰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中华前此2500年历史因之以讲明，后此2500年智慧得之以点燃。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诚然。

从学术上看，儒学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集哲学、政治、思想、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学术文化观念于一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命题，构成了中国

人特有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观。“过犹不及”、“中正”“中庸”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高超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国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道思想。追求和平、讲究秩序的理论，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载舟覆舟”的君民关系论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志士仁人反对专制集权、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士人、君子、圣人”和“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构成了中国人终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无尚法宝。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逐渐融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繁衍，创造和丰富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至今犹闪烁出熠熠光辉。

从实践上看，儒学具有孝悌忠信的道德伦理、恭宽信敏的处世哲学和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儒学尤其是一门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儒家重视教化即思想教育，注重个性修养和道德情操培养，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天下为己任”，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虽然上究“天人”之际，下探“心性”之微，形上无象，玄之又玄，但在讲究“博学”、“慎思”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笃行”。它的“仁”便是要“爱人”，“义”便是要行而得宜，“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智”便是要知晓“仁义”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成功地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与知耻自觉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儒学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民胞物与”、“孝亲敬老”、“崇德尊贤”、“诚实忠信”、“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优秀品德，这是她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之处，也是其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至今仍有其旺盛生命的魅力所在。

从文化成果上看，儒学具有庞大丰富的文献载体。儒家是以经典教育为本位、文献创造为特色的学派，儒家在历史上产生的学术文献数以万

计。自孔子修订《六经》而后有儒家文献；自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而后有儒家知识群体“弟子三千”；自《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观后，形成了儒者以“著书立说”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放眼世界，传世的古典文献以中国为多；而考诸中华，传世古文献中又以儒家最盛。这些数量庞大的儒学文献，遍布经、史、子、集，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注解和疏证，儒家诸子智慧的发挥和更新，儒学历史的记录和考订，以及儒家文化的推广和弘扬。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是智慧的记录，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加强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是认识中华古老文化的主要途径。

从信仰上看，儒学具有多元一体的信仰体系。班固说：“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助人君”是其政治功能，“顺阴阳”是其宇宙功能，“明教化”是其社会功能，“六经”是其经典体系，“仁义”是其理论核心，而尧、舜、文、武、仲尼的圣贤信仰，亦是其立教的道统体系。儒家正是以本民族的圣君贤士作为楷模，以尊天命、顺阴阳为其哲学依据和宗教情怀，以《六经》为之教典依据，以“仁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学术流派，这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指导和引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和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华学人慧命永存、日新其德的精神家园。

从教育上看，儒学具有成功的教育经验。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职业教师，具有“性近习远”、“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激励”等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有弟子三千、达徒七十二，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后世儒者如子夏、子思、孟子、荀子之徒，读其书，继其志，游说四方，传道授业，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学说，也积累和丰富了儒家教育经验。西汉汉文翁在成都设石室传授儒家《七经》，首开郡国立学传播儒学先例；汉武帝开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并在全国推广文翁经验，大兴郡国之学；还在全国举明经秀才，儒学于是成为全国教育的主体内容，也成为量士衡才的终极指标。后之继起者，无论是后汉三国，或是两晋南北朝，或是唐宋元明清，都毫无例外。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西汉以太学（或国学）、郡国府学传播儒学的教育设施，还创造和更新了以明经或科举选拔

人才的选人制度，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考试和选材经验。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也启迪和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

儒学的这些丰富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和积极影响，儒家经典是中华学人述古知新的知识源泉，儒家思想是中华学人的精神家园，儒家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儒家伦理是中华志士修身齐家的理想模式，儒家教育理论和实践也是中国人造就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成功经验。儒学在历史上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学术，是维系“大一统”局面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广泛的文化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它的陶冶下，曾经造就了大批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类历史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在儒学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也曾出现过“大汉文明”、“大唐文明”、“大宋文化”等一个又一个太平盛世和文化高峰，在历史上多次担当起世界文化中心的作用。^① 这些成就的取得，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具有主导作用的儒家学说自然功不可没。

历史降至19世纪末，中国儒学一枝独秀的历史瞬间成为明日黄花，孔庙被拆、书院转型，尤其是民国初年全盘吸收西方学制，将儒家经学从教学计划中取消，从此在中国教育界再没有儒家的地位。中国儒学被虚化、被肢解、甚至被遗忘，“中国儒学”在自己的国度顿时成为游魂孤魄，无处庇身、寄托！现行的所有学科设置、图书分类和项目管理体系，均不见中国儒学的身影！

自兹往后，百余年间，在普遍的疑古批儒风潮之下，曾经是考古知新的儒家经典被疑为非伪即残的零篇断简；曾经是精神家园的儒家思想被批驳成腐朽落后的罪因祸源；曾经是修身齐家良言的儒家伦理被诬蔑为愚忠愚孝的害瘤毒草；曾经记载了中华数千年思想文化成果的儒家文献也被斥

① 据专家统计，中世纪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科技也是相当发达的，相当一段时间占世界经济总量20%—30%，处于领先地位；宋代铁的产量已达125,000吨，相当于400年后17世纪整个欧洲的产量；中国科技在15世纪前一直领先于世人，有人统计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国约占1/2。从经济形势看，中国在南宋时期、明中叶以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都曾有较大发展，出现向产业资本发展的倾向，两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受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政策导向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才中断了这一进程。